

翻译学论丛

门外译谈

李照国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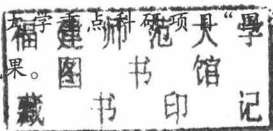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翻译学论丛

门外译谈

李照国 著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化研究”
(No. 08BYY009)、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项目“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ICTM方案
研究”(No. YYS20090010-2)、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中医英语翻译原
则、标准与方法研究”(B-7037-12-000001)、上海市教委重点课程建设项目“国
学典籍英译”、上海师范大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A-7031-12-001025)、上海师范大学重点学科项目“国学典籍翻译研究”
(A-7031-12-002001)的阶段性成果。



T0997820

苏州大学出版社

09978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门外译谈/李照国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 6

(翻译学论丛)

ISBN 978-7-5672-0084-5

I. ①门… II. ①李… III. ①西籍-中国-英语-翻
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3495 号

书 名: 门外译谈

作 者: 李照国 著

责任编辑: 汤定军

策划编辑: 汤定军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E - mail: tangdingjun@suda.edu.cn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张: 15.25 字数: 234 千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0084-5

定 价: 45.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5225020

写在前面的话

我已不惑有五,人生大半虚度,“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平生愚拙不堪,学不知至,故而无得。唯一可告慰父兄师友者,乃“好读书”,惜“不求甚解”,故而颇得五柳先生真传。我曾在一篇杂感中说:“幼时,颂宝书,读语录,似懂非懂。及长,入学堂,习洋文,始知汉字神奇。及壮,寻五材,辨阴阳,方晓人生大义、有无真谛。如今,事象寄,探译学,深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我虽先学英文,后习医学,再从译业,但对我此生影响最大的,却既非外语,亦非医学,更非翻译,而是诸子之学。宋朝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世所传颂。我虽生性笨拙,却也从《论语》等诸子之学质朴的论述中感悟了人生的是非曲直,领略了中华文化万古一脉的激越神韵和磅礴气势。

同窗好友对我从事翻译深感惋惜,以为此举颇有“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但我却从不欣然其说。虽然我对英语向无喜好,对翻译从无偏爱,对医学更无意趣,但仍然日复一日地苦苦求索于翻译之径,特别是中医翻译这条充满艰辛和挑战的荆棘之道。我在答友人之间时曾说:“之所以矢志不移奔波于此,皆因诸子之学使然。”

诸子之学虽寒暑秋露并举,天地阴阳各异,但其主旨精神却在于关乎国计民生。宋人叶适的“四无益”对诸子精神概括得最是深入浅出:“读书不知接统序,虽多无益也;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不合于大义,虽仁无益也;立志不存于忧世,虽高无益也。”

中医药学乃国之瑰宝,传译其于海外更是世之所需,“统序”、“教事”、“大义”、“忧世”尽在其中。我曾在《译海心语》中说:“我



翻译中医,实在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尽管翻得鼻青脸肿,仍然一路跟头地翻了下去。”

“知其不可为”,即知以己之力不足担此大任。从事中医翻译,既需谙熟医学,又需精通外语,还需明于国学。而我仅仅因负薪之忧而略识医理,因学业之务而粗通英文,因立身之需而初涉国学,如何担当此任?然而要使中医走出国门,造福人类,舍翻译之外别无他径。我既以诸子之学为务,当然“计利当计天下利”。所以尽管“知其不可为”,还是毅然决然地努力“为之”。这就是为什么我至今仍以研习国学为立身之本、研修国医为立业之根、译介岐黄为立命之基的因由。在谈到“巧”与“拙”的关系时,墨子说:“利于人者谓之巧,不利于人者谓之拙。”我虽拙于译事,但所译者有利于国计民生,亦可谓“巧”在其中矣。

为了寻求国医英译之道,我曾遍览诸子,感悟其说,探求译学之理,寻求译事之法。墨子说:“本不安者,勿务丰末。”对于国医翻译而言,本即是对其理法方药的深入了解,对中华文化的心感神受;而末则是对译理大要的透彻了悟,对译事大法的入微把握。不能深入了解国医的理法方药,不能心感神受中华文化的精气神韵,则难以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内涵主旨;不能透彻了悟译理大要,不能入微把握译事大法,便难以使译文在词法和句法上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初涉译海,风云变幻,源流难辨,东西不分。精研《大学》之后,方知“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才晓“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乃万物之道,自然也是译事之道。只有了解了译事的本末,才能深入其中;只有把握了译事的终始,才能浅出其外。研罢诸子,再探译道,不禁有“月照梧桐上,风来杨柳边”之感。始知译理虽高深,但其本末却明若星辰;译事虽莫测,但其终始却洞若观火。

国医翻译难,这是人所公知的事实。之所以难,除其理论的深奥之外,还有对应语的缺乏。对于这一问题,译界一直论争不休,始终难以统一。究其原因,皆在于“未得其术也”。其术何在?俱在百家。诸子之论广博,言名实之理甚众,虽未有具体法则昭示,却有无限理念足可借鉴,如荀子说:“名无固名,约之以名。约定俗

成谓之实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荀子的“约定俗成”之说揭示了语言的基本规律，足可为国学基本概念和术语翻译的统一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只要译者能循其道而从译，则译事晦明无有不取。

在译界，如何翻译国学典籍基本概念一直是各方关注的议题，却向来议而难决。原因何在？在“不知常也”。老子说：“知常曰明”，即人应懂得万物变化规律，处事要合乎自然常理，正所谓“知常则明，失常则暗。弃明从暗，乾坤倒颠。”译事若布阵用兵，循常则计出其表，失常则误在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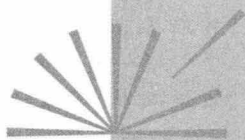
译事要符合译理，但译理并非一成不变。正如孟子所言：“尽信《书》，不如无《书》。”每见译人为一词之译而彼此怒发冲冠，总不免想起孟子的忠告：“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礼记》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就人性而言，好学力行皆为标，知耻抱愧才是本。所以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国人自来崇尚学问。所谓学问者，即学而问之是也。学之问之，则必有论之。如何而论？似乎仍是人间难题一道。常见学界同道为论而面红耳赤，甚则恶语相向。每见此景，亦不禁记起夫子之言：“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多年来，我以诸子之学为本，孜孜不倦于译事。虽因灵性所缺，悟之甚浅，但亦从中吸取了无穷教益。我常用“欲把几滴相思泪，比做长江东流水”来激励自己努力研修各家之学，用“本乱而未治者，未之有也”来鞭策自己固本立根，精译国医。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就是我二十载从译的真实写照。在未来的岁月里，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寒暑怎样交替，我都将一如既往地以诸子之学为本，以百家之论为根，以我自己的方式兴扬圣业，传扬圣学，弘扬圣道。“朝闻道，夕死可矣。”

（2005年10月为《健康报》撰）



目 录

Contents

- 溯古篇 / 001
 - 名无固名 约定俗成
 - 翻译名谓演变 / 001
 - 上古天真 在明明德
 - 古代译迹探微 / 005
 - 灵兰秘笈 先河开启
 - 从口传到笔译 / 009
- 泛舟篇 / 013
 - 文趣神思 传隔万重
 - 译道漫议 / 013
 - 圣手轻风 云游幻境
 - 译务别议 / 018
 - 山重水复 柳暗花明
 - 名译赏析 / 029
 - 道可道者 非常道也
 - 文从胡说起 / 036
- 经籍篇 / 042
 - 承上启下 万古一脉
 - 经籍英译刍议 / 042
 - 传译之要 易陈难效
 - 经籍英译六要 / 062
 - 达旨顺意 多法并举
 - 经籍翻译新思维 / 071
 - 云飞雾漫 天机神变
 - 熵化理论与经籍翻译 / 076
 - 流水万里 润物无声
 - 耗散理论与经籍翻译 / 087
 - 法于形神 和于表里
 - 信息重构与经籍翻译 / 094
 - 形与神俱 不可分离
 - 熵化翻译外感 / 101
 - 邯郸学步 亦步亦趋
 - 经籍翻译沉余录 / 110
- 运化篇 / 113
 - 古今名异 中外语歧
 - 词义演变与翻译 / 113
 - 去世离俗 积精全神
 - 形合与意合漫议 / 123

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

——信与不信纵横论 / 133

似是而非 似非而是

——名与实之辨面面观 / 143

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

——翻译局限性刍议 / 154

● 内经篇 / 165

知其往来 要与之期

——《黄帝内经》翻译研究之要 / 165

阆苑仙葩 咸宁万国

——《黄帝内经》英译与中国文化西传 / 169

若存若亡 若得若失

——《黄帝内经》英译随想 / 178

岁寒三友 欲说还休

——《黄帝内经》英译感验 / 181

谨小慎微 与时俱退

——《黄帝内经》英译原则与方法 / 199

传译之道 信者为宝

——《黄帝内经》的语言特点与英译 /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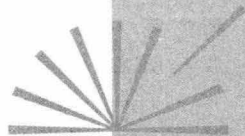
金鸣玉振 天籁之音

——《黄帝内经》的修辞特点与翻译 / 219

山隔水断 百向莫辨

——《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译感 / 231

后记 / 235



溯古篇

名无固名 约定俗成

——翻译名谓演变

在汉语中,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交流活动称为“翻译”。在我国,译事活动虽然古已有之,但对其称谓古时却很不一致。大约到了汉唐时期,“翻译”之名才逐渐形成并最终得到了统一。本文根据我国古代一些文献的记载和论述,试对“翻译”这个名称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作以简要地回顾,借以梳理我国古代翻译的历史与发展。

一、中国早期的翻译活动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彼此交往时自然缺少不了翻译。罗新璋先生在《翻译论集》中说:“大概在远古时期,我国就有了传译之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罗先生的推测是有道理的。由于文字的起源远远晚于语言的出现,所以早期先民交往中的翻译活动已无籍可考。只有夏、商、周三代的某些史料偶尔可以向我们传递一些有关翻译的点滴信息。

据文献记载,商、周王国里杂居着不少异族,如山戎、犬戎、姜戎、白狄、赤狄、戎蛮子、鲜虞等。在王国的边远地区,还生活着许多其他异族。这些异族的语言与华族不同,生活习惯各异。由于生活在同一个王国里,在日常生活和交流中,他们要么相互学习对方的语言,要么依靠熟悉彼此语言的人进行沟通,不然王国政令就无法下达,各部族间也无法往来。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左

传》中的有关记载了解一二。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戎族酋长戎子驹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言语不达。”戎族酋长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王国多民族、多语言的现状。

二、早期对“翻译”的称谓

周王国要与众多的异族交往，自然离不开翻译。从现有的资料看，周王朝对翻译活动相当重视，政府专门设置有负责协调管理翻译活动的机构并委派专门官员职掌其职。如《周礼·秋官》中说，“大行人”“属象胥，谕语言”。所谓“行人”，是周代负责接待四方使节与宾客的官员的官职，类似于今天的礼宾司司长。所谓“象胥”，是那时对翻译人员的称谓。其职责正如《周礼·秋官》所言，“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

当时对“翻译”的称谓，除“象胥”之外，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如后世将翻译人员称为“象寄之才”。“象”、“寄”也是我国古代对翻译的不同称谓。《礼记·王制》对周代所设置的翻译及其称谓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中国，夷、蛮、戎、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由此可知，在古代寄、象、狄鞮、译都是指通译言语的人。在古代，翻译人员有时也称为“舌人”，如《国语·周语》就有如下记载：“夫戎狄……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这里所说的“舌人”，便是指的翻译人员。不过，这段话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期的民族问题。

三、“翻译”称谓的逐渐统一

按照《礼记·王制》所载，我国古代不同地方的人对翻译有不同的称谓。但为什么人们后来放弃了“寄”、“象”、“狄鞮”等称谓，而统一采用了“译”呢？对此，宋代僧人法云（1088—1158）（平江景德人，即今江苏苏州人）在其所编《翻译名义集》自序中作了这样的解释：“周礼掌四方之语，各有其官。东方曰寄，南方曰象，

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今通西言而云译者，盖汉世多事北方，而译官兼善西语故。摩腾始至，而译《四十二章》，因称译也。”根据法云的解释，后世之所以统一采用了“译”，主要是因为自汉代以来中央政府设在北方，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活动的中心也在北方。的确，自汉代以来（除了南宋和明朝初年以外）中央政府都设在北方，主要的外交活动也多是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周旋。在这种情况下，对翻译活动的称呼也就自然而然地采用了北方的称谓。

四、“翻译”名称的最终形成

译事活动之称谓，在汉代以后基本得到了统一。但“译”什么时候又加上了“翻”这个“前缀”，变成了现在通用的“翻译”了呢？据史书记载，这个变化与佛经翻译有关，即佛经翻译人员在“译”前加上了“翻”字。从佛经翻译的史料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相应的蛛丝马迹。而且根据现有的史料还可以看出，佛经翻译人员开始时基本上单用一个“译”字，后来在“译”前加上一个“传”字或“转”字，有时甚至省略“译”而单用“传”表示翻译。再后来，又单用一个“翻”字表示“译”。最后又将“翻”和“译”并用，构成“翻译”一词，并逐步固定下来作为一个专业名称使用至今。下面简要地回顾以下从“译”到“翻译”的演变过程。

从早期有关佛经的翻译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译者提到翻译活动时均以“译”代之，未有其他修饰之词。例如，三国人支谦在《法华经序》中提到翻译时均使用“译”，如“偈义致深，译人出之颇使其浑漫”、“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等。再如东晋、前秦高僧道安（314—385）在其所译各种经文的序言中提到翻译时，也均使用“译”，如他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说：“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在《道行经序》中说：“桓灵之世，朔佛赉诣京师，译为汉文”。其他有关翻译的称谓尚未见到。

查阅三国前后有关佛经翻译的文献，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时的译者有时在“译”前还常加一个“缀词”，常用的是“传”，如道安在《道行经序》中说“善出无生，论空持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僧睿（？—438？）在《思益经序》中说“详听什公传译其名，翻

覆展转，意似未尽”。

有时佛经译者在谈到翻译时，不用“译”而单用“传”，如道安在《鞞婆沙序》中说“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等。再如支谦在《句法经序》中说“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今传胡义，实宜径达”等。

有时佛经译者在谈到翻译时，不用“传”而用“转”，如东晋高僧惠远在《三法度序》中说“提婆于是自执胡经，转为晋言”。

到了南北朝时期，佛经译者已开始用“翻”字指代“译”，如梁朝高僧惠皎在《僧睿传节要》中说“什所翻经，睿并参正”。到了唐代，“翻”和“译”开始并用，成了一个词，如唐代僧人道宣（596—667）在《大恩寺释玄奘传论》中开篇便道：“观夫翻译之功，诚远大矣”。唐人有时也将“翻”与“传”并用，指代“译事”，如道宣在同一篇文章中，既用了“翻译”一词，也用了“翻传”一词，如“翻传梵本，多信译人，事语易明，义求罕见”。

到了宋代，“翻译”作为一个指代译事活动的专门用语已基本得以确定，如法云在《翻译名义集自序》中不但以“翻译”作篇名，而且开篇亦说“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自此，“翻译”一词便约定俗成，四海通用。

翻译一词的演变故事，恰可用唐人赵嘏的《闻笛》一诗总括之：

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
响遏行云横碧落，清和冷月到帘栊。
兴来三弄有桓子，赋就一篇怀马融。
曲罢不知人在否，余音嘹亮尚飘空。

上古天真 在明明德

——古代译迹探微

一、《越人歌》——我国历史现存最早翻译的诗歌

周王朝建立后，大封诸侯。在王朝的众多诸侯国里，有些封国的语言与周王朝所通用的华语有较大差异。如楚国虽然与华语大同小异，但在日常事物的称谓方面仍然与华语有诸多不同。《左传·宣公四年》中说：“楚谓乳，谷；谓虎，於菟。”听起来就像上海人将“猴子”叫“莴笋”，将“同伴”叫“打字”一样。语言中存在着这样一些差异，交流起来肯定有诸多不便。

越国也是周王朝的一个封国，其语言与华语的差异就更大了，从语音、语法和词汇方面来看，实际上完全是另外一种语言，不通过翻译很难与周王朝的其他封国进行交流。汉人刘向《说苑·善说》中记载了一则楚人和越人之间交往的故事，反映了当时两国人民通过翻译进行交流的情况。

据说当年楚王母弟鄂君子皙为令尹，一日外出“泛舟于新波”，有个越人对其“拥楫而歌”。由于楚越两国语言不同，鄂君子皙只听到越人冲着自己唱道：

滥兮抃，
草滥予，
冒栢泽予，
冒州州，
堪州焉乎秦胥胥，
纍予乎昭澶秦逾，
渗悝随河湖。

由于鄂君子皙不懂越语，不知道越人在唱什么。后来通过翻

译,他才知道越人是在通过歌声向他表达仰慕之情。越人的情歌当时翻译成华语如下:

今夕何夕兮?
蹇(qiǎn)中洲流。
今日何日兮?
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
不訾(zī)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
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首越人向鄂君子皙表达爱慕之情的情歌后世称之为《越人歌》。马祖毅先生在《中国翻译简史》里提出,《越人歌》“可以视为我国历史上第一篇诗歌翻译”。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我们也许可以说,《越人歌》可能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翻译成华语的一首诗歌。

二、古代匈奴留存下的唯一文学作品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即征调大批民众前往北方修筑长城,以抵御雄居北方、严重威胁着秦王国安全的匈奴。汉朝建立以后,匈奴仍不断袭扰中国的北部疆域,对新生的汉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汉高祖刘邦曾御驾亲征,意欲一举剿灭匈奴,扫除北部边患,但因对敌情估计不足,被围白登山,差点做了俘虏。此次围困使汉朝统治者意识到,汉王朝的国力还不足以与匈奴进行最后的决战,于是变武力讨伐为和亲安抚。

到了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国力强盛,已经具备了剿灭匈奴的武力和财力。于是汉武帝派遣卫青和霍去病率领大军北上讨伐匈奴,同时派使臣前往西北各国发起外交攻势,组成了反匈奴的国际统一战线。经过军事讨伐和外交努力,汉王朝终于战胜了匈奴,扫除了边关重患。在与汉王朝的战争中,匈奴失去了水草肥美、冬暖夏凉、适宜畜牧的祁连山和燕支山。这对匈奴部族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此后在匈奴中就流传着这样一支民歌: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燕支山，
使我嫁妇无颜色。

这首读来催人泪下的民歌在《乐府诗集》卷八十四中，在结构上有所不同：

失我焉支山，
令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
令我六畜不蕃息。

《乐府诗集》中收录的这首民歌与上面的那首在内容和诗意上基本一致，但在结构上为什么有所不同呢？到底哪一首是正本呢？

在唐人李泰《括地志》卷四的《西河故事》中，也引用了这首民歌，内容和诗意与上面两首基本一致，但在结构上又有所变化：

失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蕃息。
失我焉支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同一首民歌有三种不同的形式，难免会使人发生疑问：哪是原译？哪是改译？也的确有学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发生这种情况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首民歌本来就有多种译本。在古代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条件下，完全可能有不同的译者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翻译了同一首民歌。第二种可能是不同的人对同一种译本作了改译。第三种可能是同一译本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传抄的缘故而导致了用词与结构上的变化。鉴于三种译本在用词和结构方面极为雷同，我们以为后一种的可能性最大。

由于匈奴“毋（同无）文书”（《史记·匈奴传》），古代匈奴人的民歌民谣很少保存下来。这首无名氏翻译的匈奴民歌就成了古代匈奴留存下来的唯一文学作品。

被称为古代匈奴人留存下来的唯一文学作品的匈奴民歌，史书既没有记载作者的姓名，也没有留下译者的姓名。这给我们今

天的研究留下了不尽的遗憾。

三、《白狼王歌》——第一次详细记载作者与译者的文学作品

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详细记载了作者和译者的文学作品当属用古代藏缅族语言写作的《白狼王歌》。《白狼王歌》实际上是三首诗,即《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由白狼王唐菟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所写,犍为郡(位于今四川省)椽田恭所译。难能可贵的是,译者椽田恭不但将这三首诗歌翻译成汉语,而且将其原文用汉字读音记录下来,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白狼语言材料。下面就是这三首《白狼王歌》的汉语译文和汉字记音:

远夷慕德歌

蛮夷所处,日入之部。

慕义向化,归日出主。

圣德深恩,与人富厚。

冬多霜雪,夏多和雨。

寒温时适,部人多有。

涉危历险,不远万里。

去俗归德,心归慈母。

白狼又称白兰,是古代生活在我国云南省境内的一个民族或一个小国。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一书中认为,“白狼为西羌之别种,其地在今四川理蕃县”。通过对《白狼王歌》的译文和汉字记音进行比较研究,徐嘉瑞发现白狼文中有借用汉字的现象,如“圣德”为“圣德”、“荒服”为“荒服”、“臣仆”为“臣仆”等。这说明当时白狼与汉族的交往比较多,并且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白狼王歌》对汉王朝的歌颂和崇敬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白狼王歌》不但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翻译和民族语言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我们考察和研究汉代中国的民族问题以及汉王朝与周围小国的关系亦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灵兰秘笈 先河开启

——从口传到笔译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各民族间的交往当然少不了翻译。由于文字起源远远晚于语言的出现,所以早期先民交往中的翻译活动已无籍可考。只有夏、商两代的某些史料偶尔可以向我们传递点滴有关翻译的信息。一般认为,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大约始于夏、商之际。

一、口译——我国早期基本的翻译活动形式

我们今天谈论翻译时,一般将其分为两类:笔译和口译。但在古代,翻译一般仅限于口译。在文字出现之前,翻译也只能是口译。即便是文字出现以后,由于人们的社会活动所限,翻译活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限于口译。

在我国的商、周时期,中原文化高于边陲民族,所以通达志欲只限于言语的沟通,也即所谓的口译。随着周王室对王国统治的加强以及王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周王朝加强了对翻译活动的管理。据《周礼》记载,周王朝规定,每七年要将诸侯国的翻译人员集中到周天子所在地进行训练,大约像现在由政府举办的翻译人员培训班。这大概是我国典籍中关于培训翻译人员的最早记录。这既反映了周王室对翻译活动的重视,也反映了翻译活动在王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关于周代的口译情况,我们现在从有关典籍记录中还可了解一二。如《册府元龟》里《外臣部·朝贡》中记载有周公姬旦会见越裳国来使的情况,会见时当然有翻译人员在场。下面就是对会见情况的扼要记录:

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交趾之南,有越裳